

遺我雙鯉魚

上海博物館藏明代
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集

Private Letters of Suzhou Wu School Artists
in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上海博物館
Shanghai Museum

遺我雙鯉魚

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集

Private Letters of Suzhou Wu School Artists
in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上海博物館
Shanghai Museum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集 / 上海博物館編. --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79-1580-6

I. ①遺… II. ①上… III. ①書畫家—書信集—手稿—中國—明代 IV. ①J292.26②K820.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175036號

遺我雙鯉魚

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集

上海博物館 編

主 編 楊志剛
責任編輯 王 彬 凌瑞蓉
審 讀 雍 琦
裝幀設計 姚偉延 張晶晶
圖像製作 白瑾怡 童晨琦
技術編輯 包賽明 陳 凌
印裝監製 朱國範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200050
網 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163.com
設計製作 上海貝貝藝術設計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開 本 635×965 1/8
印 張 27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數 1-2,000

書 號 ISBN 978-7-5479-1580-6

定 價 180.00圓

若有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目 錄 CONTENTS

4 前 言 Foreword

楊志剛 Yang Zhigang

6 尺牘疏略及上海博物館藏明人尺牘概說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etter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on
of Ming Dynasty Literati Letter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張 雷 Zhang Lei

14 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信札研究數題

Some Perspectives on Ming Dynasty Wu School Artists' Letters
in the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孫丹妍 Sun Danyan

32 家國民事

Concerns of Nation and Livelihood

88 茶酒韻事

Delightfulness of Tea and Wine

119 詩文雅事

Elegance of Poetry and Writings

154 書畫逸事

Connoisseurs of Calligraphies and Paintings

210 索 引 Index

遺我雙鯉魚

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集

Private Letters of Suzhou Wu School Artists
in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上海博物館
Shanghai Museum

目 錄 CONTENTS

4 前 言 Foreword

楊志剛 *Yang Zhigang*

6 尺牘疏略及上海博物館藏明人尺牘概說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etter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on
of Ming Dynasty Literati Letter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張 雷 *Zhang Lei*

14 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信札研究數題

Some Perspectives on Ming Dynasty Wu School Artists' Letters
in the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孫丹妍 *Sun Danyan*

32 家國民事

Concerns of Nation and Livelihood

88 茶酒韻事

Delightfulness of Tea and Wine

119 詩文雅事

Elegance of Poetry and Writings

154 書畫逸事

Connoisseurs of Calligraphies and Paint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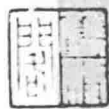
210 索 引 Index

貴家長楊韓三翁大人
元平生清雅好學子別無過惡流為窮途非仗在上者
垂聃情實難堪候好音到日或有出頭時諒亦不
厚恩也況中具此不暇他及惟冀心照不備

者末吳寬拜

題卷上奉大人親炙執事

八月九日



唐子畏被嫉于都元敬若不得文定此札不知伊
于何底後來一生潦倒佯狂參禪皆根于此今

讀文定書知子畏冤憤人情險惡可慨也



前言

在中國古代，書信被目為錦鯉、飛鴻、青鳥、彩雲。它是人們互通消息的工具，也是承載一切美好感情的使者。它是親人“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牽挂，是丈夫對妻子“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的情思，也是朋友之間“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此夕我心，君知之乎”的懷想思念。

文學史上，作為書信的司馬遷《報任安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吳均《與朱元思書》、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白居易《與元微之書》、蘇軾《答謝民師推官書》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藝術史上，早期的書法史幾乎是以書信寫就。西晉陸機《平復帖》是中國最早的法帖墨迹，被稱為“法帖之祖”，它亦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而王羲之、獻之父子留下的書迹，不論是墨迹還是刻帖，幾乎都是信手所寫的書札。它們短小而精美，猶如吉光片羽，是中國書法史長河源頭最美好珍貴的曦光。

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大量明代名人信札，尤其是明代吳門地區書畫家的信札，不僅數量眾多，而且異常精美。以史料價值而論，這些信札的內容上至朝政民生，下至家事兒女，或文章酬唱，或藝苑交游，幾乎無所不包，是對當時書畫家的生平、經歷、交游、藝術思想、審美情趣，乃至整個時代的文人生活與藝壇風尚最直接、最鮮活的反映。以藝術價值而論，信札隨意寫就，是作者在最自然狀態下的作品，它們體現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飾的書寫習慣與書法面貌，能使人們從另一個側面瞭解這些書畫家的藝術風格。

上海博物館舉辦的“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展”，遴選出館藏明代吳門著名書畫家書札精品近五十通，其中許多是首次面世，既富有史料價值，又是精彩的書法作品。為使廣大觀眾與讀者能欣賞到更多佳作，本圖錄又特地多收錄了諸多未能參加展覽的作品，以期能夠更全面地還原當時吳門書畫家的生活與藝術。

楊志剛

上海博物館館長

Foreword

In ancient China, koi fish, wild goose, messenger bird, and cloud were common metaphors for a letter. The letter was a media of communication. It was the messenger that carried love of a person to his or her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in remote place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many private letters of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admired for generations, such as Sima Qian's "A Letter to Ren'an", Ji Kang's "A Diffidation Letter to Shan Juyuan", Wu Jun's "A Letter to Zhu Yuansi", Wang Wei's "A Letter to Xiucai Pei Di, Written in Mountains", Bai Juyi's "A Letter to Yuan Weizhi", Su Shi's "A Replying Letter to Xie Minshi", etc.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 the calligraphy works in early times were composed of private letters.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scholar Lu Ji's "Pingfu Tie", known as the earliest calligraphy model in China, was a letter he wrote to a friend. The works of the famous calligraphers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 available as either authentic works or copies, were mostly casually written letters. These works are small and exquisite, like feathers falling from a bird flying through, representing the precious light of dawn in Chinese calligraphy history.

The Shanghai Museum has a rich collection of Ming dynasty literati letters. Those left by Wu school artists are especially remarkable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As historical records, these letters offe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s, family life, and artistic life of the time. The Wu school artists' personal lives and experiences, their artistic concepts and aesthetic tastes, their friend circles, and even the fashion 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ld, were preserved in these works. As artworks, they were written casually by artists in their most relaxed status, revealing their most true personalities and unfeigned handwritings, thus allow nowadays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ir art from a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The Shanghai Museum selected about 50 pieces that are valuable as both historical records and calligraphy samples for the exhibition "Private Letters of Suzhou Wu School Artists". Most of them have never been shown to public before. To present more of their works, the catalog intentionally includes high quality pieces that are not shown in the exhibition. We wish these works would help our readers to uncover Wu school artists' private and artistic lives in the Ming dynasty.

Yang Zhigang
Director, Shanghai Museum

尺牘疏略及上海博物館藏明人尺牘概說

張 雷

尺牘，乃書信之古稱，至今仍有稱書信爲尺牘者。在紙張未發明的古代，人遠兩地，人們互通信息，所言內容皆書之竹木簡牘，傳於對方。古代傳遞信息有兩種：步行方式稱之爲“郵”；騎馬傳信稱之爲“驛”。郵驛、驛站，均爲古代負責傳遞信息的機構。在魏晉墓的畫像磚中，就有一幅驛使圖，畫驛使右手執韁，左手舉信，策鞭快馬而行，生動展現了一千七八百年以前驛使傳送信札的形象。

尺牘二字最早見於《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弇以爲榮。”蓋古時用於書寫的簡牘，長度約一尺左右，故名爲尺牘。文字書寫也稱“書”，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篇中說：“書者，舒也，舒佈其言而陳之簡牘也。”杜篤《吊比干文》有“寄長懷於尺牘”之句，可見，原泛指具備授受關係的公私文書的尺牘，當時已被用作書信的通稱了。魏晉以後，雖然紙張代替了簡牘，然其所製篇幅，仍以尺幅爲例，故其名則沿而不改，至於今日。

隨着時代的變化，書寫材料及工具的變化，尺牘又有“札”“牘”“簡”“帖”之別稱。寫在木片上的稱“札”“牘”，寫在竹片上的稱“簡”，寫在布帛上的稱“帖”。所以，書信又叫“書札”“手札”“尺牘”“手簡”等。古人也有把往來書信稱爲尺翰，《陳書·蔡景歷傳》云：“尺翰馳而聊城下。”或名尺書，駱賓王詩云：“雁門迢遞尺書稀。”或名尺素，《文選·飲馬長城窟》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之句。又陸機《文賦》云：“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於寸心。”劉勰《文心雕龍·書記》云：“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此外，因爲書信須裝入封套，故亦稱“函”或“函札”；裝入封套還須加緘封，故而又稱“緘札”；又因爲古代信紙每頁八行，南北朝以來書信又稱爲“八行書”。不管其稱呼如何變化，其實質內容是一致的。

作爲“述往還之情，通溫涼之信”的尺牘，是古代的一種文體，它究竟產生在什麼時代，目前尚無確切的定論，清代姚鼐認爲書之爲體，始於周公之告君奭。但一般認爲《尚書·君奭》篇不過是一種告語文體，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書信。《詩經》中雖有涉及古人通信的些許信息，但也語焉不詳。1976年湖北雲夢秦墓中出土的秦軍士卒黑夫和驚兄弟倆人寫給家中的兩件木牘家書實物，則可以肯定當時有了通信。《文心雕龍·書記》篇裏也說：“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可知春秋之際，各種交際活動頻繁，單靠語言傳達已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故以尺牘問候替代口授辭令也就勢在必行

了。但春秋戰國時尺牘書法表現的材質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今天只能從竹木簡牘中尋找到一點信息。古人把真正意義上的尺牘書法作品定格在魏晉時代。這有幾個原因：一是自由精神的崛起。人的主觀表現欲望空前高漲，力圖尋找一種最能表現人的主體精神的媒體，而書法經過很長時期的發展，已趨成熟，特別是適宜於表現士大夫風神俊爽、天姿超邁精神風貌的行草書問世，書法遂成了揮灑人們精神意趣的最佳表現手段。二是書寫工具趨於穩定。筆、墨、紙（絹）、硯等文房用具問世，使書法的表現性更為直接，以利於情感的渲泄。三是由於尺牘的興盛。私人之間的書信往來為書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情感交流空間和展示舞臺。孫過庭《書譜》中有“傍窺尺牘，俯習寸陰”之句，並說：“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王獻之）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梁虞龢《論書表》和唐張懷瓘《書斷》中也記敘了此事，王獻之給謝安寫信，自以為必被收藏，而謝安竟在其來信後面書寫回函，然後寄還，故王獻之甚為不滿。此事是否確實姑且不論，但反映了當時士人書信往還之風氣。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名人尺牘歷來為世人所寶，其來尚矣。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的藝術性與實用目的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嚴格意義上的創作作品極少。所以，應用廣泛的尺牘便成為人們欣賞和收藏的主要對象。《漢書·陳遵傳》云：“陳遵善於文辭，與人尺牘，主皆藏棄為榮。”自斯以往，搜羅集藏，以至刻刊名人尺牘之舉，史不絕書。可見尺牘之美，古來共譚。當今傳世最早的名人墨迹，現存故宮博物院的西晉陸機《平復帖》就是一通與朋友的書札。東晉王羲之、獻之父子的書法作品為歷代書家所宗，而保存下來的書法作品，絕大部分是書札手迹。流傳至今的魏晉名迹，幾乎都是尺牘。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書法面貌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尺牘形式反映出來的。

尺牘是人際交往的工具，唐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興起，尺牘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為重要，也更為普及，逐漸顯露出世俗化和大眾化的端倪。尺牘不只是士大夫之間互相交往的手段，同時應用到社會各個階層，並逐漸擺脫禮法的約束而趨向實用。尺牘已不僅僅是士族文化修養的標志，而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市俗口語的大量應用，平凡普通的寒暄問候，使得尺牘充滿了濃鬱的生活氣息。元明時期，類似生活百科知識的書籍中，書簡、活套（尺牘中常用的套語）、家書等內容與婚喪嫁娶、營造屋舍、飼養畜禽、種植花草、醫治疾病等生活禮儀與經驗常識雜糅並列，則證明尺牘已

完全世俗化和大眾化了。

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尺牘在宋代和明代獲得了很大發展。尤其是明代尺牘，可視為散文中短小之一體，明代小品短文，能以晉人逸宕之筆調，抒發率真的性靈，竟無時尚俳薄之弊習，形成流暢清新、優美閑逸的風格，並產生了許多精彩的作品，成為魏晉以後的又一座高峰。此亦明代尺牘多美文佳作之淵藪也。

尺牘雖是私人間通信的一種形式，然其文字內容涉及甚廣。大至為政，小至米鹽，或研討藝業，有助於學術之發展；或論政講學，可補史乘之未備。若謂書藝之精，真、行、草、篆、隸，書家每因所擅而出，自由暢快，隨意所至，秀逸雄健，標格往往或異。或抒寫性靈，渲泄情感；或隨意自然，優美暢逸；或端恭厚重，收放有度；或張揚個性，筆墨恣意。書家每於不經意處多生逸趣，無怪乎古人佳帖屢出其中。要說兩地人叙寒溫，瀝情愫，互相吐訴情愫，則多為書者感受性情的自然流露。當時或許只是向友人致一聲問候，發一時之感想，或是因友人的“請索”而成人之美，或許只是仰慕前賢而揮寫他們的詩文，也許只是托書言志而並無千秋之想，正是由於無心而使這些書作流露其“真”。讀來衷曲繾綣，益增朋侶之思。其中酬應戲謔，雅飭多趣，味之足令人會心而粲。

覽其長札，恢張宏律，論析透徹而敘事周詳；而短箋亦閑雅爽利，言雖簡而意無窮。殊可貴者發言吐詞了無拘忌，絕無那些碑碣匾額、奏疏墓志的嚴肅規範而情有所拘。更能體現書家隨意自適的特點，無需矯飾，可以充分展現自身至真至美的心靈和情感。胸懷盡傾，性情畢顯。可以想象，這些尺牘的操觚者拈毫拂素間自由揮灑，心手雙暢的境界。正因為它不具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所以，尺牘書法始終代表着中國書法的自由精神！

此外，尺牘製作典雅，藻繪隱現，窮工極妍。披覽歷代尺牘之形、色、意之美，特別是明代箋紙，尤為撩人心緒，為前代所無。且用印篆刻精妙，流派紛呈，各擅其能，這些亦足娛目恬心，疏淪靈性。至其書儀，亦有異乎前代之撰者，如自署之名下加“生”，或自稱為“弟”而尊人為“丈”，書之有正、副啓也，書末署“左慎”“右衡”“空”等諸字也，此皆見所未見，知所欲知者焉。明代尺牘兼此種種妙趣，故其寸楮短素，今皆視等拱壁。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歷代名人尺牘至為豐富，宋元以前的書札函牘大多作為書法藝術的珍品曾多次陳列並影印出版。明清以來流傳的書藝作品甚夥，因無暇顧及尺牘書法的陳列和出版而致明清尺牘積於庫中。明清尺牘不僅數量多，且質量精，而迄今知者尚鮮矣。作為公眾的社會教育機構，上海博物館茲對大量明清尺牘加以整理研究，並遴選其精者付梓

出版。在明代尺牘中，根據不同地區的書家為脈絡，擬以吳門地區書畫家尺牘為首卷，陸續推出分卷。向世人展示館藏明賢尺牘之真髓原貌，其漑沔書林，有墨鉤棗雕之《閣帖》所不可比擬者。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明代尺牘中，當朝名人幾乎齊全，除了那些書家、作家、詩人、畫家之外，一些封疆大吏、宮廷臣屬，特別是晚明的各種歷史政治人物尤多。這些書札的內容較為系統，文史資料豐富，極有文物文獻價值。較之前代，大臣之屢遭廷杖，科舉之開考製藝，內亂與外患之交織，是皆前代事之變本加厲者。又除嚴削魏之牽朝政本末，東林復社又涉清議黨爭，士大夫通問中屢屢及之。

古代尺牘，其內容時常具有私密性，還有豐富的社會生活資料，耐人把玩。每一通書札都像一篇小品文，或語及文苑，則臺閣、七子、唐宋、公安、竟陵輩出主入奴，是丹非素之爭，以及命運坎坷，生活潦倒，不平之事每每形之楮墨。其他如謝人贈物，談詩論詞，書畫品賞，甚至如酣醉蓋因狎妓而狂的放蕩之類，皆一一在書札中自由展現。種種文人交往，士林心態，頗見時世，層層面面地勾勒出一幅細膩的明代士人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生活長卷，情文并茂，細觀細讀之，令人時而掩鼻悲嘆，時而捧腹歡笑，時而膛目驚異，時而拍案怒髮上衝冠，時而仰天長嘆，為古人擔憂。人之七情盡在其中，令人在鑒賞把玩之餘，知古人之思，解古人之情，探古人之幽，品嚼再三，回味無窮。

明代書家，繁若星雲，所謂“人既國器，文亦鴻寶”，其中祝京兆之勁健、文衡山之集美、董香光之秀逸、黃石齋之峭厲，皆足以領袖群倫，籠罩一代。故前人有“明人無不能書”之說。以書言之，明人極善行草，又能楷書，尤其是小楷，故近人馬宗霍說：“明人類能行草，雖絕不知名者，亦有可觀，簡牘之美幾越唐宋。”“小楷亦劣能自振。”綜觀明代之書，貴在未失晉人帖書之風韻，短箋長卷，意態揮灑，風格多樣而面目獨具，頗多雅趣。

明中葉的蘇州地區，是世所公認的明代書法重鎮，一批或官或民的書法家如雨後春筍般地涌現，他們不約而同地返回到古代藝術傳統中去汲取營養。

學書“多所自得”的李應禎，又名維熙（熊），景泰年間中鄉舉，入太學，及至成化年間，又以善書選為中書舍人。弘治初歷太僕寺少卿。由於李應禎平時耻以書名，所以每當別人有所求索，總是“不應”的多，故作品傳世稀少。就字論字，李應禎書法的水平，筆者以為當在明初諸賢之上。我們在本集中看他的幾件尺牘，落筆恣縱，大氣淋漓，在行書裏糅進篆書筆法、草書氣勢。墨色淡雅通透，點畫起落交代清楚，通篇磊磊落落，老筆

紛披，實為難得。難怪文徵明說：“應禎博學好古，而所自得為多，當為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虛腕疾書，今人莫能及也。”

師法黃庭堅的沈周，年輕時曾受舉薦，但終生未仕，潛心詩文書畫，家中收藏豐富，常與李應禎、吳寬、王鏊等文人集會，飲酒賦詩，並提携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後輩書畫家，開創了“吳門書派”的興盛局面。沈周善山水，精花鳥，書法學宋代黃庭堅，多取其筆勢。他既是“吳門畫派”的領袖，又是“吳門書派”的先驅。本集所收尺牘墨迹可見黃庭堅之影響。

書學蘇軾的吳寬，乃明代飽學之士，其人行為高潔，品性溫和，人望甚高。在蘇州時與友人沈周共同提携後輩，蘇州成為盛極一時的書畫藝術中心，吳寬等人的栽培引導，功不可沒。吳寬長於詩文，工書法。他愛好蘇軾的詩文，書亦學蘇軾。雖少蘇書的豪放磊落之氣，而書風極盡藏鋒，筆力厚重沉著，自出新意。其同鄉，時任高官的王鏊曾評價他“作書姿潤，時出奇崛，雖規模於蘇而多自得”。本集所收《致歐信札》是為科場作弊案所累，唐寅乞情的書信，惜才不平之情溢於尺素。

書法師晉人，官至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的王鏊，人稱“震澤先生”。他平生好靜，在翰林院時閉門勤學，遠避權貴，只喜文辭翰墨，詩文俱佳。書法清勁有古色，得晉唐筆意。其尺牘書法清勁，結字疏朗，具有細勁堅挺，岸然森嚴的意趣。

然而，真正造成“天下書法歸吾吳”顯赫聲勢的，是他們稍後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寵三家，他們是明代中期吳門書派的代表。當時的蘇州既是全國人文薈萃之地，又是商品經濟和市民文藝的中心，一大批文人墨客活動於此。他們的書法創作，承接宋人尚意傳統，演化出千姿百態的風貌，既用作自娛的需要，同時也是治生的手段，故富於市民化色彩。

祝允明作為“吳門書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為人狂放不檢約，其書法被推為“有明第一”。他博採眾長，臨摹功深，諸體皆能，由蘇、米、黃而上溯旭、素，所作風骨爛漫，氣勢奔放，才情橫溢，尤以小楷與狂草為世所推重。本集刊載其書札，風格各異，令人大飽眼福。《劉姬詞與致朱凱札》等書是其致尊長的書札，為仿鍾繇筆法的古風小楷，書風嚴謹。《致文貴札》為其草書風格，狂放任性，肆情恣意，灑脫天成。雖為短札，却不輸其鴻篇巨製，洵為不可多得的祝書妙迹。

本集對“吳門書派”之執牛耳者文徵明及其子孫和主要門人的尺牘書法作了較為全面的展示，其間不僅多有希見之品，同時又充分體現了這一書家群體的整體風貌與最佳

水准，可以此瞭解文氏一門書家傳承發展的清晰脈絡。

文徵明爲人謹慎篤實，性格上與祝允明大相徑庭。據書史記載，徵明幼時并不聰慧，年七八歲時尚訥於言語，“既長，穎異挺拔，日記數百千言”。他十九歲從沈周學畫，二十二歲從李應禎學書，二十六歲從吳寬學文，故學業大進，聲名日隆。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并稱爲“吳中四才子”。文徵明的書法大多是從王羲之、趙孟頫及黃庭堅的筆意中融合而來。他臨學精博，兼擅各體，小楷尤其精整。他流傳的作品以法度嚴謹，筆法遒勁，骨肉停勻，風格雅致名世，時人稱他爲“書苑中蓋代之人”。因其用功極勤，年壽又高，及至九十歲依然能作蠅頭小字，且格法不懈，筆筆精到，不墮荒卒，人以爲仙。文徵明旺盛的藝術生命，爲後世留下了大量書作，是中國書法史上少見的高產作家。其書風影響至三吳、太倉、常熟、嘉定、無錫乃至松江、南京、泰州及浙、閩一帶，成爲經久籠罩南方書壇的領軍人物。堪稱“風靡天下”。本集所刊書札，其書或疏朗灑脫，靈秀蕭散，或法度嚴謹，圓熟精致，自首至尾無一懈筆，確如“風舞瓊花，泉鳴竹澗”，殊爲難得。

三家中，“疏拓秀媚，亭亭天拔”的王寵，表現出更多的晉人豐神，儘管他的書法沒有祝、文那廣博的書學基礎，但他對晉人的書法精髓却挖掘得相當深刻。他號雅宜山人，資性秀異，能詩善文，尤工書法。他以王獻之、智永、歐陽詢爲規範，在他有限生命的後期變出己意，以拙取巧，鈍中有利，有古雅純樸的特點。除行草書外，小楷書的成就尤高，結字疏宕蕭散，似乎拙乎點畫安排，實質上是有意識地減少筆畫之間的連接，使之顯得筆斷意連而疏落斑駁，古意盎然，一掃臺閣體楷書的僵板。本集所收書札運筆適美而圓渾，不在速度的快緩、力量的輕重上求節奏的變化，而是穩穩地、緩緩地着意於返筆、復筆、搭筆和圓轉、方折的筆法變換，故能散朗多姿，出鋒處委婉地收住，更顯得停勻而含蓄，從中可以看到他蕭散俊逸，筆墨內斂，筋骨內含，遒勁疏爽的書藝特點。

祝、文、王三家外，吳門地區的書家還有不少，或在朝，或在野，或兼能繪畫，或專工書法，率皆表現爲掙脫臺閣體，上追唐宋，以文人性情結合市民趣味的傾向。

以“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自況的唐寅是畫家而兼書家，他是弘治十一年鄉試解元，赴會試時因泄題舞弊案受牽連，遂絕意仕途。作爲“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畫名尤高，與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稱“吳門四家”。其書法追求晉人典雅之趣，長於行楷書，由李邕、顏真卿、蔡襄而下窺趙孟頫，作風妍美。其書札筆精墨潤，隨意揮灑，風華四溢，才氣翩翩，有種流美的韻度。

文徵明的長子文彭，博學多才，書、畫、印俱能，篆刻開明清流派印風之先河。其書

在繼承父風的基礎上能“不蹈父迹”，且“咄咄逼其父”，篆、隸、楷、行草均有佳作傳世。文彭的書法得其父精整端莊之長，運筆輕鬆流暢，使轉輕靈圓潤，字與字每多連綿，但輕重快慢的變化及和緩舒暢的節奏能自然流出，章法能巧用空白，有天高雲淡，飛鴻輕翔之美。他的《致友人札》用筆飄逸爽利，結體疏朗蕭散，雖可見文徵明的用筆規範，更蘊含了懷素、孫過庭的筆致情趣。

陳淳以水墨大寫意花卉畫名世，畫法完全得益於書法，而他的書法，論者以為可與祝、文、王三家齊駕并驅。其楷書受業於文徵明，後來自闢門戶，溢為行草，由歐陽詢、李邕下窺楊凝式、米芾，亦受祝允明影響。用筆速度快疾，頓挫明顯，節奏感強烈，其書“筆氣縱橫，天真爛漫，如駿馬奔騰，似翔鸞舞空”。因以中鋒圓筆為主，又顯得遒勁溫婉，氣格清健。本集所收《致顧貞叔札》可謂秀美扎實，別闢奇徑。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曾說：“道復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韻，遂成側媚，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橫可賞……”又明張寰《白陽先生墓志銘》說他“從太史衡山文公游，涵糅磨琢，器業日進，凡經學古文，詞章書法，篆籀畫詩，咸臻其妙，稱入室弟子”。

其他吳門書畫家諸如文嘉、王穀祥、錢穀、黃姬水、周天球、居節、王穉登、陳元素、邵彌等皆各具面目，各有所長，風格雖然迥異，但都展現出雅正、文秀的特徵，這不僅是吳門藝壇的地域特色，也是明代中期主要的藝術風尚。

尺牘之於書法，就像詞之於詩，詩言志，為大道，詩不能盡，發而為詞，詞雖為詩餘，亦有其獨有的細膩幽微，最終堪與詩并稱。尺牘雖不能代表一家全面的書法風格，但却能真實地展示他的藝術修養與審美情趣，也是研究藝術史的一個豐富的資源。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etter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llection of Ming Dynasty Literati Letters in the Shanghai Museum

Zhang Lei

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article,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etymology of “*chidu*” (let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re are different terms refer to letters depending on the material they are written on, which is also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writing media. The earliest physical evidence of exchanging private letters dates back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letters were written on wooden slips. By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private letters were regarded as calligraphy works worth of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This came alo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early scholar-official class, these officials’ intention to express their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inventions of new stationeries. When a scholar’s calligraphy was highly valued, his private letters would be collected and used as models to follow. Other than being appreciated as calligraphy works, the letters survived today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contain information of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ety of their time.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letters of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i, which is abundant in Shanghai Museum’s collection, and discusses the calligraphy and artistic styles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artists.